

李系德《隆情岁月》的地景叙事与文化记忆建构

肖冠南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摘要：本研究以李系德《隆情岁月》为研究对象，从地景叙事与文化记忆建构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李系德的地景叙事呈现三个鲜明特点：一是“由下而上”的平民化视角，聚焦街头小吃、老式戏院等日常生活空间；二是饮食地景的核心位置，通过描绘地方饮食构建城市味觉地图，将文化记忆转化为感官体验；三是独特的方言语言特色，大量运用粤语词汇、谐音修辞与口语化表达，创造兼具地方特色与抒情深度的叙事语言。作者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建构文化记忆与地方感：空间记忆的个人化叙事，将城市地标与个人成长经历紧密结合；感官体验的记忆化处理，通过精准捕捉感官细节使读者重温城市味道；历史事件的空间化表达，如“五一三”种族冲突在金华戏院的亲身经历，展现历史事件在城市空间中留下的记忆刻痕。这些叙事方式背后是作者对城市空间的深度情感投入与文化认同，体现了段义孚地方感理论与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交织应用。与同代马华作家相比，李系德的城市书写更为平实亲切，通过方言书写与饮食地景，构建了一幅充满市井气息与情感温度的吉隆坡城市图景，为马华文学的地景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李系德；《隆情岁月》；地景叙事；文化记忆；身份认同；方言书写；马华散文

一、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马华散文的地景书写传统源远流长，从早期的南洋风物描摹到现代城市空间的文学再现，始终是马华文学中不可或缺的表现向度[1-3]。华人作为离散族群，在马来西亚这片异域土地上的生存境遇与情感认同，往往通过对地景的观察、记忆与书写得以表达[4, 5]。这种书写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描绘，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确立过程，一种寻找精神归宿的努力。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马来西亚城市化进程加速，马华作家的目光从乡村转向城市，形成了独特的城市书写传统[6]。这一传统既继承了中国文人“游记”的抒情特质，又融入了现代散文的审美特征，同时吸收了在地文化元素，构成马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7, 8]。

李系德的《隆情岁月》出版于2024年4月，是一部以吉隆坡为书写对象的散文集，分为六辑，以城市地理区域为编排依据，涵盖了从老城区到新兴地段的广阔空间。翻开这本散文集，

我们仿佛跟随作者漫步在记忆的长廊，在粤语谐音的文字游戏中，在飘香的猪杂粥的热气里，在五一三事件的惊魂夜里，触摸到一座城市的脉搏与一个族群的情感归属。《隆情岁月》的创作恰逢吉隆坡城市更新加速之际，许多承载集体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面临拆除或改造，现代化与传统保存的张力日益明显。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李系德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地方情感，通过散文记录城市变迁的痕迹和人文气息，不仅表现了吉隆坡的物质景观，更挖掘了隐藏在城市表象之下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脉络。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李系德采用了大量粤语写作，这一语言选择本身就具有文化身份标识的意义，反映了作者在语言与文化传承上的自觉意识[9]。在全球化背景下，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往往面临被标准化语言替代的危险[10, 11]。李系德通过在文学创作中坚持方言书写，既是对文化多样性的维护，也是对地方感构建的有力支持。他的粤语书写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谐音、幽默、口语化表达等丰富技巧，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学语言，使读者能够通过文字听到吉隆坡街头的方言声腔，感受城市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

本研究以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和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为支撑，探析李系德《隆情岁月》中的地景叙事策略及其建构的文化记忆，具有多重学术价值。在马华文学研究中，关于城市书写的专题探讨尚待深入，尤其是对特定作家如何通过地景叙事建构文化记忆的系统研究相对缺乏。聚焦于李系德的《隆情岁月》，为马华城市书写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切入，有助于揭示华人族群如何通过文学书写保存和建构集体记忆，抵抗现代化进程中的记忆消逝，这对理解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再者，李系德的粤语书写策略为研究马华文学的语言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探讨方言与文学创作、文化保存的复杂关系。最后，通过对比其他马华作家的地景叙事，将李系德置于更广阔的文学脉络中考察，不仅能够呈现个案的独特性，也有助于勾勒马华散文地景书写的整体图景。这一研究尝试将文学分析与文化研究、地理空间与记忆理论相结合，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创新性。

1.2 文献综述

1.2.1 马华文学的地景叙事研究现状

马华文学研究中，地景叙事一直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研究视角，它不仅揭示了马华作家如何通过地理空间书写建构文化身份，也反映了马华文学与在地经验的复杂互动。近年来，随着空间转向在文学研究中的深入，地景叙事研究在马华文学领域展现出新的活力[12-14]。张锦忠在《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中提出，马华文学的地景书写是建构文化想象的重要媒介，它既承载着对故土的追忆，也反映了对在地空间的认同[2]。这种双重地景想象构成了马华文学的独特品质，是理解马华文学如何协商自身文化定位的重要视角。

许文荣则从政治抵抗诗学的角度，探讨马华文学中的地景叙事如何成为文化抵抗的策略[10]。通过对本土空间的书写与重构，马华作家表达对主流文化霸权的反思，建立起一种基于地方经验的文化认同。这种抵抗不仅是政治层面的，更是文化层面的；不仅是针对殖民历史的，也是针对后殖民语境下新型文化霸权的。因此，地景叙事成为马华作家确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手段，

体现了文学与地方政治的深刻联系。

在城市书写方面，谢征达对新马都市叙事模式的研究具有开创性[12]。他以丁云小说为例，归纳出怀旧模式、现实模式和前卫模式三种都市叙事模式，这为理解马华城市地景书写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这三种模式反映了马华作家面对城市空间时的不同态度和策略：怀旧模式注重历史记忆的挖掘与保存，现实模式关注城市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前卫模式则尝试通过实验性的叙事手法重新想象城市空间。李系德的《隆情岁月》在这一分类中，似乎兼具怀旧模式与现实模式的特征，既关注历史记忆的保存，又注重日常生活空间的细致描绘。

马超群与蒋成浩则关注马华文学中的本土历史重构，指出地景书写是马华作家构建本土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15]。通过对地方空间的描绘，作家们试图建立起一种本土的历史叙事，与官方历史话语形成对话。这种通过地景书写重构历史记忆的努力，反映了马华文学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是马华文学特殊历史处境的产物。对于像李系德这样关注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作家来说，这种历史重构不一定是宏大叙事的形式，而可能表现为对城市微观变迁的细致记录，对个人与集体记忆交汇点的挖掘。

王列耀与彭贵昌关注“花踪文学奖”与马华文学新生代的崛起，认为新生代作家的地景书写更加关注城市经验和跨文化实践，展现出与前辈作家不同的空间感知和审美取向[16]。这种变化反映了马华文学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调整自身的文化位置，是文学与社会互动的自然结果。在这一背景下，李系德的城市书写虽然聚焦于传统空间和集体记忆，但其方言书写和感官叙事等特色，也体现了当代马华文学的某些新趋势。

然而，如潘碧华所指出的，马华文学的现代阐释中，对于特定作家如何通过地景叙事建构文化记忆的系统研究相对缺乏[17]。特别是针对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的散文作品，研究者往往更关注其文化身份表达，而对其地景叙事策略、修辞手法以及与文化记忆建构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剖析。李系德《隆情岁月》作为一部以吉隆坡为书写对象的散文集，其地景叙事的独特性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因此，本研究试图填补这一研究空白，通过对《隆情岁月》地景叙事的系统分析，揭示马华散文地景书写的新维度。

1.2.2 文化记忆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文化记忆理论为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记忆建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建构，认为个体记忆总是在特定社会框架中形成的[18, 19]。个体记忆不是孤立的心理过程，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和文化媒介得以形成和确认的。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用以分析文学作品如何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播。文学作品作为文化媒介，不仅记录和反映集体记忆，更积极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形成和重构过程，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和传递媒介。

扬·阿斯曼（Jan Assmann）对文化记忆的研究则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领域，他区分了交流性记忆与文化记忆，强调文化记忆是通过制度化的纪念实践得以长期保存的集体记忆形式[20, 21]。交流性记忆依赖于日常交流和口头传递，具有短暂性和变动性；而文化记忆则通过文字、仪式、纪念物等文化媒介得以固定和传承，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这一区分为理解文学作品在记忆传

承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文学作品既可以记录和反映交流性记忆，也可以参与文化记忆的形成和巩固。

在马华文学研究中，文化记忆理论的应用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贾颖妮通过分析张贵兴“雨林三部曲”中的华人拓荒史书写，揭示了文学作品如何通过地景叙事建构历史记忆，成为抵抗遗忘的文化实践[22]。陈瑶琼则关注新生代马华小说中“中国性”的呈现，探讨文化记忆如何在跨代际传递中发生变异与重构[23]。岳寒飞在研究马华作家黎紫书《流俗地》的空间叙事时，分析了空间书写如何成为记忆保存与身份建构的策略，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24]。

然而，现有研究在将文化记忆理论应用于马华散文分析时，常忽略了地方感与文化记忆之间的辩证关系。地方感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主观感知，更是文化记忆得以附着的情感基础。没有深厚的地方感，文化记忆就缺乏情感支持和个体认同，难以形成真正的集体认同；同样，没有文化记忆的积累，地方感也难以超越简单的空间依恋，达到文化认同的深度。李系德《隆情岁月》中充满情感的地景书写，正是地方感与文化记忆相互建构的典范。本研究将文化记忆理论与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相结合，试图构建一个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揭示《隆情岁月》地景叙事与文化记忆建构的内在机制。

1.2.3 吉隆坡城市书写的相关研究

吉隆坡作为马来西亚首都，其城市书写一直是马华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早期研究多关注吉隆坡如何在马华文学中被表征，以及这种表征与作家身份认同的关系。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中指出，早期马华作家对吉隆坡的书写多带有异域情调，体现了离散族群对异地空间的观察与适应[1]。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吉隆坡城市书写的多元面向及其文化意涵。黄万华在《马华文学：在中国与本土之间》中分析了吉隆坡在马华文学中的象征意义，认为它既是现代性的代表，也是文化杂糅的场域，反映了马华作家对本土与他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25]。

近年来，随着空间转向在文学研究中的深入，吉隆坡城市书写研究呈现出新的趋势。佟伯明探讨了“局外人的凝望”这一视角在马华文学城市书写中的表现，分析了作家如何通过陌生化的观察重新发现城市空间的文化内涵[26]。王璇则关注台湾作家如吴浊流对南京与台湾的地景想象，这种跨地域的比较研究为理解马华作家对吉隆坡的书写提供了参照系[27]。刘秀珍从后现代视角探讨新世纪台湾散文的空间书写与身份认同，其分析方法也为研究吉隆坡城市散文提供了启示[28]。

在饮食地景方面，马华文学研究也展现出丰富成果。周银银从离散视角分析了《无声告白》中的空间叙事及其文化隐喻，特别关注了食物如何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29]。这种研究视角对于理解李系德《隆情岁月》中丰富的饮食地景书写具有启发意义。张翼在分析安琪诗集《暴雨和绵羊》时，探讨了地景、民风与文化记忆的关系，指出地方性饮食成为连接个体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30]。李文珊与焦迎春则关注黄锦树小说中的“地景诱惑与气氛迷狂”，分析了感官描写如何营造地方氛围，这对理解李系德散文中的感官书写提供了有益参照[31]。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小说或诗歌中的吉隆坡书写，对散文，特别是李系德这类以粤语为主要书写语言的散文关注不足。同时，研究者往往将目光局限于地景书写的文化政治意涵，

而对其审美特质与叙事策略缺乏深入探讨。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不足，通过对《隆情岁月》的系统分析，揭示吉隆坡城市散文的叙事艺术与文化意义，同时考察粤语书写在地景叙事中的独特作用，为马华散文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

1.3 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

本研究采取文本细读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李系德《隆情岁月》为核心文本，探析其地景叙事策略与文化记忆建构的内在联系。在理论框架上，主要借鉴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构建起地景叙事与文化记忆研究的分析模型。

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为理解作家如何通过文学书写建构地方意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核心概念“经验空间”指出空间意义的形成源于人与环境的互动经验，这种经验不仅包含客观感知，更涵盖情感投射与文化诠释。在李系德笔下，吉隆坡的街巷、戏院、饮食摊位等都是经验空间的具体呈现，通过日常生活实践被赋予了超越物理维度的文化意义。“地方依恋”概念揭示了人对特定地点的情感连结是如何通过长期居住与互动而逐渐形成的，这种依恋超越了简单的空间喜好，而成为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系德对半山芭等城区的深厚感情正是这种地方依恋的文学表达。而“空间情感投入”则说明了情感如何转化冷漠的地理坐标为充满意义的文化地景，成为维系个体与环境之间纽带的关键要素。通过段义孚这些理论视角，我们将分析李系德如何通过饮食记忆、方言表达和个人叙事，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充满情感共鸣的文化地景。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则为考察文学作品如何参与文化记忆建构提供了分析工具。“记忆的社会框架”理论强调记忆不是孤立的个人心理活动，而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形成并获得确认的集体产物。李系德对吉隆坡城市空间的记忆，虽以个人经验为基础，却通过华人社群共享的文化符号系统表达与传播，因而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记忆的物质锚点”概念揭示了物质空间如何作为记忆载体，使抽象的历史经验获得具体的物质依托。文中描述的老式戏院、传统饮食摊、城市地标等，都成为华人社群集体记忆的物质锚点，通过这些具体空间，抽象的历史记忆得以保存与传承。“通过共享记忆形成的集体认同”则说明了共同的记忆经验如何促成群体意识的形成，使分散的个体凝聚为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社群。李系德通过方言书写与文化记忆的挖掘，实际上参与了马来西亚华人社群集体认同的建构过程。

在方法论上，将文本细读与跨文本比较相结合。首先，对《隆情岁月》中具有代表性的地景叙事进行细读，分析其叙事视角、修辞手法、语言特色等文本内部要素，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与文化内涵。其次，将李系德的地景叙事置于马华文学的广阔语境中考察，通过与其他马华作家如黄锦树、黎紫书等人的作品比较，凸显《隆情岁月》地景叙事的独特性。再次，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考察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分析《隆情岁月》的地景叙事如何回应城市现代化、文化多元性、身份认同等议题。此外，特别关注李系德的粤语书写策略及其在地景叙事中的作用，揭示语言选择与文化记忆、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一理论框架将贯穿全文，引导我们对《隆情岁月》中城市空间书写、饮食地景描述与历史记忆重构的系统分析。通过段义孚地方感理论中的“经验空间”、“地方依恋”与“空间情感投入”等概念，解析李系德如何通过细腻的城市描绘与情感投射，将客观城市转化为具有文

化意义的地方；运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中的“记忆社会框架”、“记忆物质锚点”与“集体认同”等思想，探讨文学书写如何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承，在城市急速变迁的今天保存并重构华人社群的文化记忆。通过这一理论框架，我们将揭示李系德《隆情岁月》地景叙事背后的文化意涵与审美价值，为理解马华文学的地景书写传统提供新的视角。

二、《隆情岁月》的空间地理书写

2.1 城区地理与空间叙事

漫步在李系德笔下的吉隆坡街头，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平实亲切的市井气息，仿佛每一个角落都诉说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他的城区书写不是冰冷的地理坐标，而是融入了个人情感与文化记忆的人文地景。通过对“火治街”(Foch Avenue)的细腻描摹，作者揭开了城市命名背后的文化流变。当地人称之为“指天街”，这个民间命名源自街上店铺“漫天开价”的商业行为，一个简单的地名折射出市井生活的智慧与幽默。

这种民间命名实践的背后，是段义孚地方感理论中所强调的“经验空间”的形成过程[32, 33]。民众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对空间进行重新定义和命名，赋予原本中性的地理空间以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李系德对“指天街”这一民间命名的记录，不仅是语言现象的捕捉，更是对地方文化创造力的深度揭示。这种自下而上的空间实践，反映了城市居民如何通过语言行为抵抗官方话语的单一叙事，创造出多元、丰富的城市文化景观。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框架下，这些民间地名作为社会记忆的载体，提供了一种共享的文化参照系，使社群成员能够通过这些语言标识建立共同的空间认知和情感纽带。

随着城市更新，这些民间地名逐渐被官方命名所取代，火治街改名为禎禄路(Jalan Cheng Lock)。这种地名变迁不仅是符号的更替，更是殖民历史、民族独立与现代城市规划多重叙事的交织[34]。从法国元帅福煦(Foch)到华人领袖陈禎禄(Cheng Lock)的命名转变，反映了从殖民统治到民族独立的权力更迭，展现了城市空间如何成为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李系德对这一命名变革的敏锐观察，揭示了城市空间作为文化记忆场域的复杂性，既是国家历史叙事的展演舞台，也是地方文化认同的协商场所。

对半山芭(Pudu)的书写尤为动人，洋溢着温暖的个人情感：“在整个吉隆坡，我感情最深的地区就是半山芭，因为我从五岁至三十三岁都住在这里，度过了成长时期那段年少轻狂的岁月”。这段直白的情感表白，将城市空间与个人生命历程紧密相连，展现了地方感如何通过长期居住与情感积累而逐渐形成。在段义孚的理论中，地方感的产生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情感的投入，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越密切，地方感就越强烈。李系德对半山芭的深厚情感，正是这种长期居所形成的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典型表现，反映了地方不仅是物理实体，更是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半山芭”这一民间称呼的坚持使用，是文化主体性的宣示，也是后殖民语境下空间去殖民化的实践。当李系德选择坚持使用“半山芭”而非官方名称“Pudu”或音译的“富都”时，他实际上参与了一种文化抵抗的空间实践，通过语言选择表达对殖民空间命名的反抗，维护华人社群对城

市空间的文化解释权。这种看似微小的语言选择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政治意涵，是文化记忆与身份政治在城市空间中的具体表现。

2.2 地标建筑的记忆场域

李系德笔下的吉隆坡地标建筑不是静态的城市景观，而是承载着丰富文化记忆的生命体。戏院作为公共文化消费空间，在作者笔下绽放出特殊的记忆功能。在《猛鬼中华戏院制造歪脖国民》中，作者回忆四岁时的首次观影体验："到中华戏院看梁无相和郑碧影主演的粤语歌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戏里的人全都以唱歌来取代讲话的呢？"这段天真的童年回忆，展现了文化传统如何通过观影体验传递给下一代。

从文化记忆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华戏院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扮演着哈布瓦赫所称的"记忆的物质锚点"的角色。通过放映粤语电影，戏院成为连接异地华人与原乡文化的重要桥梁，使文化传统得以在跨地域的空间中传承。李系德对《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传统爱情故事的记忆，反映了集体文化记忆如何通过具体的文化产品在个体记忆中留下印记，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35]。特别是他对歌唱方式的童稚疑惑，揭示了文化传统在跨代际传递过程中的认知差异和理解过程，展现了文化记忆传承的复杂动态。

"歪脖子"这一形象的深层隐喻，揭示了离散华人在文化认同建构中的尴尬处境。从空间理论的角度分析，作者坐在"最前面那排旁边第一张座位"的位置，象征着华人社群在马来西亚社会中的边缘性位置。这种空间位置的偏斜导致银幕形象的扭曲，可被解读为文化传统在离散环境中的变形与重构。李系德的"歪脖国民"自嘲，正是对这种文化杂交状态的形象表达，反映了他对离散华人身份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中华戏院中的鬼怪传说，展现了民间叙事在异地空间重构中的重要作用。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需要具体的空间作为载体才能持续存在。在离散环境中，移民群体往往通过将原乡的民间信仰和叙事移植到新环境，以创造文化连续性和安全感。戏院中"鬼大爷"的座位和鬼怪故事，是华人传统民间信仰在异地空间的再现，通过这些鬼怪叙事，陌生的空间被纳入熟悉的文理解释体系中，获得了文化意义和情感连接。这种看似迷信的民间实践，实际上是文化适应和身份重构的重要策略，使移民群体能够在新环境中建立文化主体性和归属感。

大华戏院的集体观影文化，凸显了公共空间作为社群互动与记忆形成场所的重要性。戏院作为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提供文化产品的消费场所，更创造了社群交流和互动的可能性。"剥花生壳声、嗑瓜子壳声、婴儿啼哭声、婆嬸高声讲戏文声"这些声音元素构成的声音景观(soundscape)，展现了早期华人社群的公共文化生活特点，反映了集体观影经验如何成为社群记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特殊的观影文化，与现代影院的安静、私人化的观影体验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现代性进程中公共文化空间功能的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实践的转变。

2.3 自然景观与城市互动

李系德笔下的吉隆坡不仅有城区街道和地标建筑，还有与城市生活紧密交织的自然景观。在《马鹿狸花园与大内群英车》中，作者将 Taman Maluri 以谐音戏称为"马鹿狸花园"，展开对

自己丰田轿车的趣味叙事。这种谐音命名不仅展现了粤语文化的语言创造力，更反映了文化认同如何通过语言游戏得以表达与维系。李系德对"Maluri"与"马鹿狸"的谐音联想，正是这种诗性功能 的体现，通过语音相似性建立起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桥梁，创造出一种兼具本土特色与族群认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这种语言创造不仅是个人的语言游戏，更是族群文化适应性的集体表现，反映了华人社群如何通过语言创新融入多语环境，同时保持自身文化特色。

作者记述这辆车在 1998 年 9 月 6 日被盗，恰逢"副首相安华行将被捕，支持者正要举行'烈火莫熄'示威"的历史时刻。这种个人记忆与历史事件的交织叙事，体现了哈布瓦赫所提出的记忆社会框架理论——个体记忆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形成和确认的。通过将私人事件与公共历史相联系，作者不仅为个人记忆提供了时间坐标，更展现了个体生活如何嵌入宏大历史进程，个人经历如何成为理解历史的微观窗口。这种叙事策略超越了简单的个人回忆，成为一种"历史从下"的书写方式，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呈现历史事件的多元面向，丰富了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

《陈秀连路铁厂和大水灾》中对 1963 年大水灾的叙述，展示了自然灾害在集体记忆形成中的催化作用。灾难社会学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往往成为集体记忆的转折点，通过共同的灾难经历，社会群体形成特定的情感纽带和互助网络。李系德与同学因水灾而建立的友谊，正是这种现象的典型案 例，展现了灾难如何在破坏物质环境的同时，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和集体记忆。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揭示了灾难在文化记忆中的双重性——既是创伤的来源，也是新型社会关系和集体叙事的催生剂。通过对这一水灾记忆的书写，作者不仅保存了城市历史的重要片段，也展现了自然环境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复杂互动关系。

《寂寞儿童公园打鞦韆》中将宋词名句"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改编为粤语谐音"寂寞儿童公园打鞦韆"的创意表达，展现了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从文化理论的角度看，这种将古典文学与现代生活经验相结合的语言实践，体现了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的活态传承。与简单照搬或彻底抛弃传统不同，李系德的方言改编展示了一种创造性的文化继承方式，通过语言创新使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生活语境，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又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力和时代内涵。

在李系德的城市书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多层次的城市文化地图，空间地理、地标建筑与自然 景观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丰富立体的城市记忆场域。他通过个人化的叙事视角，将吉隆坡的物理空间转化为充满情感和意义的文化地景，展现了城市空间如何成为个体记忆与集体认同交汇的平台。在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今天，李系德的地景叙事既是对消失中的城市记忆的抢救性记录，也是对城市文化地层的深度发掘，为理解马来西亚华人的城市经验与文化认同提供了独特而珍贵的文学视角。

三、饮食地景与文化记忆

3.1 街头小吃的地方记忆

若说李系德笔下的吉隆坡有一种独特的气质，那必定是能够品尝的城市。《隆情岁月》中

最动人的篇章往往与饮食相关，作者通过对街头小吃、粵式酒楼、客家菜肴的细腻描绘，构建了一幅吉隆坡的味觉地图，使文化记忆转化为感官体验，让读者能够通过文字重温城市的滋味。

颂记客家式牛肉粉老店在李系德笔下成为文化记忆的醒目坐标。作者通过感官描述和方言表达，将日常饮食赋予了独特的地方文化意味："吃前得先发挥'捞世界'本领搅拌均匀"。"捞世界"一词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粤语文化特有的生活哲学与表达方式——它不仅描述了一个具体的烹饪动作，更暗示了一种彻底、全面的生活态度。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这种饮食行为不仅是满足生理需求的活动，更是一种赋予空间文化意义的实践。"捞世界"这一方言表达，正是华人社群通过日常饮食实践形成的文化惯习，展现了语言与生活方式、文化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店名"颂记"与粤语"松记"的谐音修辞，被作者诙谐地解读为"似有吃饱就'松记'走人'的意思"。这种对商业名称的谐音解读，揭示了华人社群如何通过语言游戏为日常空间赋予文化趣味。从符号学角度分析，这种命名实践创造了多层次的意义系统——表面上是简单的商业标识，深层则是社群共享的文化密码。"颂记"/"松记"的谐音联系，正是一种文化神话的建构，通过语言符号的双重指涉，将商业空间纳入社群的文化想象，形成特定群体才能完全理解的文化认同标志，成为哈布瓦赫所说的记忆的物质锚点，在物质与象征之间摇摆，既是具体的物理空间，也是抽象的文化象征。

半山芭为食街的猪杂粥在作者笔下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友情记忆的载体。他将友人谢文成的生死别离与猪杂粥紧密关联："数年前谢文成因癌症去世，最令我痛心的是他走得很突然，他在家安详地睡了过去，我都没有机会与他好好道别，遑论到他家里探病。"这种个人记忆与饮食空间的紧密联系，使平凡的食物升华为情感记忆的象征物。"粥香虽仍在，故人却已消逝人间"，这简单的一句，道尽了时光流转、人事变迁的感伤。从段义孚的地方依恋理论看，食物超越了其物质性而成为记忆的载体，通过感官经验连接过去与现在。猪杂粥的味道、质地和温度，成为连接逝者与生者的情感纽带，展现了饮食如何在个体记忆与文化遗产中发挥桥梁作用。

猪肠"嚼下去'Chok Chok 声'"的拟声描写，直接再现了食物口感，让读者仿佛与作者共享这碗饱含记忆的热粥。这种通过感官描写唤起共同记忆的叙事手法，体现了哈布瓦赫所强调的集体记忆如何通过物质载体跨越时间延续。在感官人类学研究中，味觉与嗅觉记忆被认为是最原始、最持久的记忆形式，其唤起情感的能力远超视觉和听觉。李系德对猪杂粥口感的细致描绘，正是利用了这种感官记忆的持久性，使读者能够通过味觉想象重温那已逝的友情和时光。

"为食街"这一民间命名形成的地名，映照了空间如何通过文化实践被重新定义。"为食"一词在粤语中形容贪吃好食的性格，这条街因汇集众多食肆而得名，显示了饮食文化如何塑造城市空间特征。"为食街"这一命名正是这种战术性实践的表现，体现了普通民众如何通过命名行为重新定义城市空间，创造出官方地图上找不到但在集体记忆中存在的文化地标。这种由下而上的命名过程，反映了文化记忆的民主性建构，是普通人参与城市文化生产的重要方式。

为食街记录的文化冲突事件，如梅兰传教示威和"成记茶楼"黑帮械斗，揭示了饮食空间作为社会历史记忆载体的复杂性。这些事件不仅是简单的暴力冲突，更蕴含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

会矛盾和权力关系。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看，公共饮食空间常常成为社会冲突的展演舞台，因其开放性和人流密集的特性，使其成为集体记忆形成的重要场所。为食街正是这样一个多时间层次的记忆场所，从日常饮食享受到社会冲突事件，不同时期的集体记忆在此交汇叠加，构成了复杂立体的城市文化记忆图景。

3.2 特色餐厅的文化标识

李系德通过对港式餐饮的描述，展现了跨地域文化传播的饮食景观。"港饮港食"餐馆中"盆菜"在吉隆坡流行的历程，呈现了饮食文化跨地域传播的轨迹。盆菜作为香港新界的传统美食，其在马来西亚的流行不仅是餐饮种类的增加，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延伸和重构[36]。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饮食是文化传播中最易被接受的元素之一，常常成为文化交流的先导。盆菜在吉隆坡的流行，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符号的跨地域流动，以及华人文化圈内部的交流网络，展现了阿帕杜莱所言的"文化流"(culturalscapes)如何通过具体的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作者细致描绘了盆菜的制作过程和内容构成："把鸡鸭、猪肉、鱼虾、鲍鱼、冬菇、支竹、红萝卜、白萝卜、金针菇等海味山珍杂七杂八放在一大盆里蒸煮，吃的时候大家围着那口大镬或大盆，各自用公筷夹自己喜欢的菜式来吃。"这种对饮食细节的精准捕捉，不仅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通过食物描述传递其中的文化内涵。盆菜的共享方式象征着团圆和谐的社群价值观，大盆与公筷的使用实践体现了华人文化中集体分享、等级有序的传统价值观。通过这一饮食符号的详细阐释，作者不仅记录了一道菜品，更解读了其中蕴含的文化符码，展现了饮食如何作为文化载体在异地环境中传承与重构，成为连接不同地域华人社群的文化纽带[37]。

"山贼烧鹅"菜名源于厨师外貌特征的命名实践，被作者妙趣横生地描述："山贼烧鹅'的来头，是师傅长得黑黑实实，剃着平头，竖起双目时杀气腾腾，活似一副山大王模样，因此给人绰号'山贼'。"这种将厨师个人特点与菜品名称相结合的命名方式，展现了港式餐饮文化重视个人风格与品牌特色的商业策略。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看，这种个人化的饮食命名反映了现代餐饮业如何通过故事营销创造独特的文化记忆。这种"食物故事化"的现象，体现了法国学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言的"景观社会"特征——现代社会中，商品不仅是物质产品，更是文化形象和社会表征的载体。通过菜名背后的故事，食物超越了简单的物质消费，成为文化消费和身份展演的媒介。

合发酒楼在李系德笔下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承载着家族记忆和社区历史的文化场所。作者通过父亲作为点心师傅的经历，展现了华人餐饮业如何成为家族生计与身份认同的依托："老爸曾在半山芭合发酒家当师傅，是制作点心师傅，专门做蒸笼点心。"从段义孚的地方依恋理论看，这种职业记忆揭示了餐饮业在早期华人移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提供了经济生存的途径，也是文化技能传承的场域，体现了职业与族群认同的紧密关联。

父亲外号"九美"与辫子被剪事件的关联，将个人家族史与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相联系："老爸原本留着长长的辫子，在上海当过侍应生，老爸年轻时很英俊，老母给他取个'九美'绰号，我估计他应该有'七八分'靓仔。后来革命党兴起，结果有次被人一刀剪掉了他的辫子，十分心痛，怒冲冲离开上海到南洋谋生。"这段家族回忆融合了个人经历与历史事件，展现了个体生命史如何

嵌入宏大历史叙事。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社会框架理论看，这种家族口述历史是理解大历史事件在日常生活层面影响的重要资料。剪辫子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象征性事件，通过个人经历的具体呈现，使抽象的历史叙事获得了鲜活的人文面貌。这种“微观历史”(microhistory)的书写方式，为理解华人移民史提供了另一视角，揭示了历史变革如何塑造个体命运，影响人口迁移和文化传播的历史轨迹。

城市文化生态变迁中，书店衰落与餐饮兴起的对比，在作者笔下催生出深刻的文化反思：“以前这里有陈文杰书店，如今都让餐厅店取而代之。看来这个时代，都系‘食得唔食书’，大家宁愿花钱买人生短暂满足的食物，却不愿买书来充饥己身。”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分析，这种空间功能的转变反映了消费文化对知识文化的挤压，凸显了现代社会中物质消费对精神消费的替代。作者将传统格言“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戏改为“书终尚有鱸鱼肉，书终幸有黄鸡屋”，这种带有自嘲色彩的文字游戏，实则蕴含着对现代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深刻批判。

3.3 饮食记忆与身份认同

李系德通过对啤律(Peel Road)地区粤式美食的描述，展现了粤菜在马来西亚本土环境中的变异与创新。“醉猫”海鲜菜馆名称的创意解释，体现了粤语文化中独特的幽默感与生活态度：“这么奇怪的餐馆名称，其实是创办人移植了香港兰桂坊当年一间以卖海鲜的饮食店为蓝本，取其吃饱饮醉而兴起的这个名堂。摆明来到这里就要饮饱食醉，醉到似只懒猫一样‘死吓死吓’，天跌落嘴当被面，死人都唔理！”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这种饮食空间的跨地域移植与本土化改造，展现了文化传播中的“本土化”(localization)过程。远不是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在新环境中的创造性转化，既保留原有文化符号又融入本地特色的混合形态。

华姨与石招牌两家客家酿豆腐的地方变异，反映了华人饮食文化在移民过程中的适应性与创造性：“石招牌的则不同，外形煎得金黄，香脆可口，这口感颇与华姨的酿豆腐不同，可见两家主理人承传方法与口味颇有差别。”这种对同一菜品不同制作方法的细致区分，不仅展现了作者敏锐的味觉感知能力，更从文化演变角度揭示了饮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分化现象。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看，这种变异不是文化衰落的表现，而是文化生命力的证明，展现了传统饮食如何通过创新适应新环境，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又发展出新的特色。李系德通过对这些微小变异的细致观察，揭示了文化传统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活态传承，超越了简单的“原真性”追求，展现了文化传统在实践中的动态性与创造性特质。

李系德对牛肉料理的细致区分，展现了饮食体验中的文化认同细微差异：“对我而言，吃牛腩大王的腩肉，红烧牛腩则啗三星牛腩，喝牛杂汤就到梁开记，各有专长！”这种对不同部位牛肉最佳食肆的精确区分，反映了饮食消费作为文化身份标识的社会功能。从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看，这种细致的饮食选择不仅是味觉满足的追求，更是文化品味的展示和身份认同的表达。通过强调对不同牛肉料理的专业知识，作者确立了自己作为饮食鉴赏家的文化身份，体现了饮食知识如何成为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将饮食体验与家人情感联系：“大约是受家父从小影响，每次煮午餐必定煮牛肉汤。家父一家子大细都好爱食牛肉的！”这种家族饮食偏好的记录，展现了饮食作为情感连接的重要媒

介。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看，饮食习惯常常是最早形成的文化记忆之一，通过家庭饮食习惯的传承，文化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形成和巩固。饮食不仅是满足生理需求的行为，更是家庭情感纽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共同的饮食经验，家族成员形成共享的感官记忆和情感认同，构建起维系家族凝聚力的文化基础。

斯嘉镇(Taman Segar)不同族群饮食的描述，展现了多元饮食文化的交融与共存："斯嘉镇另有马来人林立的宵夜摊，那边的羊肉粥和马来炒粉很有名，我最爱的是 Auntie Lora Kopitiam 的亚参叻沙，感觉够晒酸辣，让人回味无穷。"通过对不同族群特色美食的欣赏，作者展现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饮食常常是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最易于交流的领域，成为文化对话与互相理解的重要媒介。李系德对马来美食的欣赏，反映了华人社群如何通过饮食实践参与跨文化交流，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欣赏并接纳他者文化，形成开放而包容的文化认同。这种多元饮食文化的描述，揭示了马来西亚作为多元文化社会的独特魅力，展现了不同族群如何在日常饮食实践中建立文化对话与相互理解。

总结而言，李系德《隆情岁月》中的饮食地景叙事，构建了一幅立体多元的吉隆坡饮食文化地图。他笔下的街头小吃、特色餐厅和族群美食，不仅满足口腹之欲，更承载着集体记忆、建构文化身份。作者通过粤语书写与谐音修辞，为饮食地景赋予了独特的方言文化气质，展现了语言选择与文化认同的深刻联系。在理论层面上，这些饮食叙事体现了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饮食空间如何通过情感投射与文化实践，从单纯的物理场所转变为充满意义的人文地景；同时也印证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展示了饮食如何作为社会框架，形塑并保存集体记忆。通过对饮食地景的细腻刻画，李系德成功地建构了一幅充满市井气息与人情温度的吉隆坡城市图景，为马华文学的地景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四、城市变迁与历史记忆

4.1 旧建筑的消逝与重建

吉隆坡城市天际线的嬗变，在李系德的笔下宛如一场无声的权力更迭。蘇丹阿都沙末大楼(Sultan Abdul Samad Building)被他形容为"被打落冷宫的大婆"，这一富有意境的比喻，道出了城市地标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沧桑命运。这座建于1897年的英国殖民时期行政中心，曾经是吉隆坡的城市灵魂，"1972年吉隆坡升格为市发行的政纪念邮票，正是以大钟楼为画案"。然而，随着1999年国油双峰塔的崛起，这座承载百年历史的建筑被悄然边缘化，如同一位曾经备受宠爱却终被时代抛弃的"大婆"，"惨被'打落冷宫'！"

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看，蘇丹阿都沙末大楼作为记忆的物质锚点，其地位变化反映了城市记忆的权力重构。大楼从城市核心地标到边缘化景观的转变，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如何通过空间象征重新定义城市记忆的中心与边缘。这一过程不仅涉及物理空间的变化，更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如何重塑集体记忆的焦点。作者对这一变迁的敏锐观察，揭示了城市记忆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整合与筛选，某些历史痕迹被突出，而另一些则被淡化。

作者回忆童年时代，大钟楼的钟声如同城市的心跳，每天准时在吉隆坡的街头巷尾回荡。

这种城市声音景观 (soundscape) 成为集体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听觉印记。然而，随着城市的急速发展，这钟声渐渐消隐于喧嚣的都市交响中，“我们大钟楼的钟声已经‘哑火’响不起来了！”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钟声作为城市日常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消失不仅是声音环境的变化，更是城市感知方式的转变。钟声是将抽象时间具体化的媒介，其消失象征着传统时间秩序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影响减弱，体现了经验空间如何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重构。作者的感叹中，透露出对城市文化连续性被中断的隐忧，这种对城市声音环境变迁的感伤，恰如哈布瓦赫所言，集体记忆通过感官体验得以形成，亦因感官刺激的消失而逐渐褪色。

光艺戏院的命运转折，则呈现为文化连续性中的微妙变异。从放映华语粤语电影转向西方电影，这一转变不仅是放映内容的更替，更是全球文化潮流对本土文化空间的渗透与重塑。作者对观看《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的细腻描述，犹如一幅跨文化交流的生动画卷，展现了在特定时空中，文化边界的流动与融合如何形成新的审美体验与记忆印记。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社会框架理论看，戏院作为记忆的物质锚点，不仅保存特定内容的文化记忆，更反映了记忆框架自身的历史变迁。戏院放映内容的转变，折射出马来西亚社会文化取向的微妙转变，展现了集体记忆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调整其参照系统。

Fajar 超级市场（大地超级市场）的消失，在李系德笔下成为城市日常空间消逝对个人记忆的深刻冲击。这座“走中下层路线的平民商场”承载着作者八十年代的家庭生活片段，每一次的日常购物都是生活史的一页篇章。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在超市购买“带有鲜艳蓝色的鹦哥鱼”的情景，这看似平凡的消费经历，却是家庭记忆的重要载体，见证了一个普通家庭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与情感纽带。从段义孚的地方依恋理论看，超市作为日常生活空间，通过重复的购物体验与家庭互动，逐渐形成了情感连结，成为个人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当这一空间消失时，不仅是物理环境的变化，更是个人与家庭记忆的物质载体丧失，引发了对个人历史连续性的思考。

李系德巧妙地引用 Beyond 的歌曲《大地》，将个人记忆融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表达：“当唱到‘秋风秋雨的度日，是青春少年时……’，正好可缅怀昔日青春时期来此购物的岁月。”这种将流行文化元素与个人记忆相互映照的叙事策略，不仅展现了集体记忆如何通过文化媒介得以传递与共享，更赋予了个人回忆以时代的共鸣与文化的厚度。通过对 Fajar 超市消失的抒情书写，作者揭示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记忆保存的深层困境——物理空间的消逝，如何导致集体记忆的碎片化与文化连续性的断裂。

4.2 城市现代化的记忆断层

Mid Valley 谷中城作为“亚洲最大商城”的崛起，在李系德笔下成为现代商业空间重构城市生活与记忆的典型案例。作者以犀利的观察笔触，描绘周末与公共假期商场附近道路的交通拥堵景象，这种城市病症的刻画，揭示了现代商业空间与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深刻矛盾，反映了消费文化繁荣背后的城市功能失调。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现代商场作为新型城市空间，创造了与传统街区截然不同的空间体验，导致了城市感知方式的转变[38]。交通拥堵作为现代城市病症，不仅是物理问题，更反映了现代消费空间如何重塑了城市居民的行为模式与生活节奏。

谷中城内的多元饮食体验，在作者笔下成为现代商业空间重构传统饮食文化的生动写照。特别是对港式云吞面的评价：“吃一碗细蓉配大大颗的鲜虾云吞，旅游香港尝到的那种美好感觉又回来了”，这种跨地域的味觉记忆唤起，展现了现代商业空间如何成为文化记忆的连接节点，使异地经验在本土空间中得以重现与延续，创造出一种跨越地理边界的文化认同。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看，现代商场通过重现全球各地的饮食体验，创造了一种去地域化的记忆空间，使消费者能够在同一物理空间内体验多元文化记忆，这种记忆体验虽然便捷，却可能缺乏传统饮食空间的文化深度与社会网络。

然而，作者敏锐地洞察到这种现代商业空间中的饮食体验存在深刻局限。超市烘焙店曾经提供“烘制大大个的海南面包”，让人们得以“重温儿时风味”，但这种承载集体记忆的食物，因“价格廉宜而利润不高”而被商业逻辑无情淘汰。这一细节的捕捉，揭示了商业资本如何重塑传统饮食文化，使那些承载深厚文化记忆但经济效益不彰的食物，在现代消费空间中渐趋消亡。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正是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文化记忆断层的微观表现，暗示着集体记忆如何在市场逻辑的压力下被边缘化与遗忘。从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看，这种由商业驱动的食物选择，可能导致地方特色的减弱与均质化，使饮食空间失去其独特的文化标识与情感纽带。

吉隆坡新街场四楼公寓在李系德笔下，绽放出个人生命历程中不可替代的情感光芒。从少年时代“以放大镜聚焦之灼热阳光烧死蚂蚁来玩”的童趣游戏，到与萧开志的友谊沉淀与成长，普通的居住空间在记忆的浸润下，转化为人际关系网络形成的有机土壤。萧开志“带我进入学生周报学友会，令我渐受文化熏陶，才走上写作这条路”，这段看似平常的友谊叙述，实则揭示了居住空间如何超越其物理功能，成为个人生命叙事中的转折节点，影响了作者的文化取向与职业道路。从段义孚的地方依恋理论看，这种在特定空间中形成的人际关系与文化启蒙，是地方依恋形成的关键因素，反映了物理空间如何通过社会互动与文化交流，转化为深具个人意义的生命场所。

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自己写下的第一封情书“竟也是递交上新街场四楼的”情景，虽然这封情书是为好友代笔，但这一“充当‘枪手’帮好友代笔”的青涩经历，已成为青春记忆中温暖而生动的片段。整个送信过程被作者比作“上演一场《西厢记》中‘红娘递柬’的戏码”，这种将日常经历戏剧化的叙事手法，赋予了普通居住空间以浪漫的文学意蕴，使生活的平凡瞬间闪烁着文化想象的光彩。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看，这种将个人经历与文学传统相联系的叙事策略，展现了文化记忆如何为个人记忆提供解释框架与表达模式，使个体经验在集体文化的映照下获得更丰富的意义层次。

文章结尾的感叹：“吉隆坡新街场那十五座四楼粗屋几年前已全部拆卸，却埋葬不了我那段烧蚂蚁、被车撞、送情信的荒唐有趣少年旧梦”，道出了物理空间的消失与记忆延续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物质锚点理论看，当记忆的物质载体消失后，记忆本身并不必然随之消亡，而是可以通过叙事重构与文化传承得以保存。建筑可以倒塌，街景可以改变，但铭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却能穿越时空的阻隔，在叙事的重构中获得永恒的生命。这种对已消失空间的文学重建，为集体记忆搭建起一座抵抗遗忘的桥梁，展现了文学书写在保存文化记忆中的重

要作用。

4.3 历史事件的空间刻痕

"五一三"种族冲突在城市空间中留下的历史伤痕，在《五一三金华看戏夜惊魂！》一文中获得了震撼人心的文学呈现。李系德首先以日常的笔触，描绘金华戏院(Metropole)平常的观影氛围："总见到一名肤色黝黑的中年人在叫卖零食，以沙哑的嗓子喊着：'脆蚕豆南乳花生！'"这种充满感官细节的场景重现，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年代的戏院内，闻到零食的香气，听到叫卖的吆喝，感受到普通民众在和平年代享受文化娱乐的闲适与欢愉。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这种日常感官细节的积累，正是空间获得文化意义的基础，通过这些细微的感官体验，物理空间逐渐被赋予情感色彩与文化内涵，形成特定的地方感知。

这种日常文化空间在历史重大事件中的戏剧性转变，构成了文章的情感高潮。1969年5月13日的那个夜晚，原本只是作者独自前往金华戏院观看电影《窗》的普通日子，却因历史的暴风骤雨而永远铭刻在记忆深处："戏还未放映完戏院就开门放所有观众出去了，我还蒙查查，不知大马发生了种族冲突暴乱，失魂落魄随着人群乱闯赶回家去。走到半路，就听到身后响起连串机关枪声！"这段简练而震撼的叙述，将个人的观影记忆与国家的历史创伤紧密交织，展现了哈布瓦赫所强调的记忆社会框架如何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被重构。日常观影这一平凡经验，因突如其来的历史事件而获得了非凡的记忆意义，成为个人理解国家历史的重要参照点。同时，个人的具体经历也为抽象的历史叙事提供了生动的细节与情感维度，使宏大历史在微观层面获得了具体的人文呈现。

金华戏院从日常的文化娱乐场所，在一夜之间转变为暴力冲突中的临时避难所，这一功能的急剧转换，揭示了城市空间在危机时刻的应急重构，以及集体记忆如何通过特定场所而具象化、空间化[39]。这种对历史事件的空间化记忆叙事，正是哈布瓦赫所强调的记忆与空间之间的互文关系——重大历史事件需要通过具体空间获得物质锚点，而空间的文化意义也在历史事件的冲击中被重新定义与拓展。金华戏院因"五一三"事件而在作者记忆中获得了超越普通娱乐场所的深层意义，成为个人与国家历史相遇的见证，展现了记忆锚点如何在历史事件中获得新的文化内涵。

时光流转，现代化的谷中城美佳广场(Mid Valley Megamall)内的GSC影城已拥有"二十一间迷你戏院"，这种空间规模的扩张与设计的革新，反映了观影文化从集体共享的单一大厅，向更加个性化、分散化的多厅模式的演变。这种空间形态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精细化分工，也暗示了现代社会中集体文化体验向个人化体验的转向，反映了城市文化生活的深刻变革。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这种观影空间的变化不仅影响了观影的物理环境，更改变了观影的社会性质与文化意义。多厅影院的设计使观众被分隔在相对封闭的小空间中，减少了传统大厅影院中的社群互动与集体反应，创造了更为私密化的观影体验，反映了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体化、私人化的趋势。

现代影城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选择多样性，GSC"还设有国际院线，选映一些以前难有机会观赏到的欧洲艺术电影，每年更定期举办各地电影节"。这种全球化的电影资源整

合与文化供给，展现了现代城市文化空间如何连接本地观众与全球文化产品，创造出超越地理边界的文化体验与记忆模式，拓展了城市居民的文化视野与审美边界。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看，这种全球化的文化消费创造了新型的记忆社会框架，使本地观众能够通过观影分享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记忆，形成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化认同。然而，这种全球化的文化体验也可能导致本地文化记忆的稀释与边缘化，引发文化同质化的担忧。

然而，现代化的观影空间也呈现出日益明显的阶层分化特征。The Gardens Mall 内的 Signature 影城以其奢华设施与高端服务，将观影体验推向享乐主义的极致，但“票价高达六七十个令吉，贵到‘拍颤’！”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奢华影院，当然是那些‘几百万未开头’的‘把炮之人’才舍得花钱享用”。这种观影空间的阶层化现象，揭示了城市文化消费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新的社会区隔，使文化记忆的形成与传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分层，反映了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平等问题的新挑战。从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看，这种消费空间的阶层分化可能导致城市居民对共享空间的体验差异加大，使城市认同出现碎片化，影响城市的社会凝聚力。

作者以自己在影院“仆街”受伤的亲身经历，为文章划上意味深长的句号：“额头撞到地上去，损伤了一块；左额上留下一道伤疤印记，过了好一段时间才消散。”这一看似平常的意外事件，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可被解读为现代观影空间的象征性隐喻——表面光鲜亮丽的现代文化空间，实则隐藏着不易察觉的阶梯与断裂，反映了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文化记忆的不连续性与潜在危险，暗示着在城市急速发展的表象之下，个体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而脆弱。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看，这种物理伤痕作为记忆的身体锚点，将空间经验与身体感知紧密联系，创造了一种具身化的空间记忆，使抽象的文化体验获得了具体的身体印记，展现了记忆如何通过多重感官通道被保存与唤起。

通过这种个人化的空间经验叙事，李系德揭示了现代观影空间的多层次意义，以及个体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城市文化环境中，协商自身的身份定位与记忆构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城市现代化与文化记忆互动关系的独特视角。

五、语言表达与地方感构建

5.1 粤语书写的地方特色

李系德在《隆情岁月》中挥洒着粤语词汇与表达方式，如同在白纸上泼墨绘就一幅色彩斑斓的吉隆坡地景图。这种语言选择绝非仅是个人习惯的随性展现，而是马来西亚华人社群文化身份的深刻烙印，是对城市记忆的独特注解。在《生滚牛肉片、滑鸡粥、猪杂汤》一文中，作者描述颂记客家式牛肉粉时巧妙运用“捞世界”一词，这看似简单的粤语表达，实则蕴含了整个社群的生活智慧与语言创造力。“捞世界”不只是形容一个搅拌食物的动作，更是描绘一种彻底、全面的生活态度——将所有元素混合在一起，不遗余力，不留痕迹。

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这种方言表达本身就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特定社群如何通过语言实践赋予日常活动以文化意义。方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地方感的语言载体，通过其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表达方式，创造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认同。李系德对“捞

世界"等粵語表達的運用，展現了語言如何成為經驗空間的重要元素，幫助社群成員在日常實踐中構建共享的文化理解框架。

諧音修辭如同一條蜿蜒在李系德文字間的溪流，時而歡快，時而深沉。在《被打落冷宮的大婆 大鐘樓》中，作者將馬來亞獨立的历史時刻與粵語的語音巧妙聯結："聽來像廣東話的'米跌架'，正合形容'米字旗跌下旗杆架'！"這一語言的跨界遊戲，不僅為嚴肅的历史敘事增添了几分生活化的親切，更展現了華人社群如何通過方言文化解讀與內化历史經驗，將宏大敘事融入日常生活的語言實踐中。當他解讀"頌記"這一店名時，指出"'頌記'以華語念來頗像粵語的'松記'，似有吃飽就'松記走人'的意思"，這種商業空間命名的諧音解讀，揭示了方言文化如何在城市空間中留下獨特的語言印記，成為理解商業文化的另一扇窗戶。

粵語的口語化表達在李系德筆下化作一縷縷感官的魔法，直接击中讀者的心灵深处。在《為食街猪杂粥 稠浓情更浓》中，作者筆下的猪腸"嚼下去'Chok Chok 声'"，這種擬聲詞的妙用不僅精準捕捉了食物的口感，更如同一場聽覺的盛宴，讓讀者仿佛能夠透過文字，聽到那清脆的咀嚼聲，感受那彈牙的質地，品味那獨特的美食體驗。從段義孚的經驗空間理論看，這種感官描寫不僅傳遞信息，更重現了地方的感官記憶，將抽象的地理空間轉化為可感可觸的具體經驗，使讀者能夠通過文字在感官層面與特定地方建立連接。在描述《醉猫》海鮮茶館的命名由來時，"擺明來到這里就要飲飽食醉，醉到似只懶猫一樣'死吓死吓'，天跌落嘴當被面，死人都唔理"，這段充滿粵語韻律的描述，不僅展現了餐廳名稱背後的文化邏輯，更釋放出粵語表達特有的幽默感與生活態度——在飲食中尋找極致的放鬆與享受，在日常中體驗生活的極樂與逍遙。這種語言風格如同一杯陳年佳釀，既有方言文化的地方醇香，又有人生智慧的深厚回味。

5.2 多語環境下的文化雜糅

李系德的敘事語言猶如一條穿梭於多元文化河流中的小舟，自如地航行於馬來西亞特有的語言版圖之間。在《從前的 Pavilion——光藝戲院》中，作者將中文與英文地名交織成一幅城市記憶的錦緞："如果提起 Pavilion，新一代當然知道是指武吉免登超高檔的柏威年購物商場。但對老吉隆坡而言，御會緬懷起從前坐落在 Bukit Bintang Road 路口與 Pudu Road 交接處的光藝戲院。"這種語碼轉換不是簡單的語言混搭，而是對吉隆坡作為後殖民城市複雜語言生態的精準映照，揭示了不同世代如何通過各自的語言習慣構建對同一城市空間的不同認知與情感連結。

從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看，這種多語言並置反映了記憶的社會框架如何隨著語言環境的變化而轉變，不同語言背景的群體如何對同一空間形成不同的集體記憶。通過呈現這種語言差異，作者不僅記錄了城市空間的物理變遷，更反映了城市記憶的代際分化與文化轉型，展現了集體記憶的形成與傳承如何受到語言環境變化的深刻影響[40]。這種多語言敘事策略，成功捕捉了吉隆坡作為多元文化城市的語言多樣性與历史複雜性，為理解城市記憶的多層次構成提供了重要視角。

作者對地名的多語言闡釋尤為敏銳，如同一位文化考古學家，從語言層疊中發掘城市空間的歷史與情感意涵。在《Fajar 大地消失 不留历史痕迹》中，他指出："Fajar 超市的中文名既是'大地'，來此處唱 Beyond 的《大地》似乎就最貼切了。"接着又補充"馬來文'Fajar'就是'黎明'"，

这种对不同语言体系中地名含义的多角度解读，不仅展现了作者的跨文化素养，更揭示了地方命名如何在多语环境中获得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连接不同族群记忆的情感纽带。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这种多语言地名解读展现了空间意义的多元构成，同一物理场所如何因不同语言群体的命名与解释而获得多层次的文化意义，反映了经验空间的丰富多样性与文化包容性。这种多语言交织的地名解读，正如同一曲由不同文化音符组成的城市交响，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特定社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5.3 叙事语言的修辞特色

感官描写在李系德笔下如同一把精巧的钥匙，开启读者记忆中尘封已久的感官宝库。在《五一三金华看戏夜惊魂！》中，戏院叫卖零食的场景被赋予了立体的感官质感：“只见到一名肤色黝黑的中年人在叫卖零食，以沙哑的嗓子喊着：‘脆豌豆南乳花生！’他只是卖这两样自制的镇山宝，豌豆煲得脆脆软软，南乳花生也炸得极为香脆，都很好吃。”这段描述如同一幅多感官的城市素描，视觉上捕捉了叫卖者的肤色与形象，听觉上再现了那沙哑的吆喝声，味觉与触觉上则唤起了食物的口感与香气。

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这种多感官描写不仅传递信息，更重现了特定场所的完整感官体验，将抽象的空间转化为具体的身体感知，使读者能够通过文字与历史空间建立身体连接。段义孚强调，地方感的形成依赖于全身心的感官参与，而非单纯的视觉观察。李系德对城市声音、气味、味道的精准描述，正是对这一理论的文学实践，他通过文字唤起读者的感官记忆，使抽象的城市记忆转化为具体的感官体验。通过这种全方位的感官重构，作者不只是描述一个场景，而是创造了一个可以被读者通过感官记忆重新体验的历史时刻，使抽象的城市记忆获得了具体可感的质地。

拟人化修辞在李系德手中化作一支魔法画笔，为城市的无生命体赋予了情感与性格。在《被打落冷宫的大婆 大钟楼》中，蘇丹阿都沙末大楼被塑造为一位被“打落冷宫”的“大婆”，这一形象生动地捕捉了古老建筑在现代城市中的边缘化处境。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物质锚点理论看，这种拟人化不仅是修辞手法，更是一种记忆策略，通过将建筑拟人化，作者将抽象的城市变迁转化为具体的人际关系叙事，使读者能够通过熟悉的人际关系模式理解抽象的城市发展历程。通过这种拟人化的叙事策略，作者使城市建筑不再是冰冷的石块与钢筋，而成为有情感、有故事的城市角色，使读者能够通过熟悉的人际关系模式理解抽象的城市发展历程。这座大钟楼从城市地标到被新建筑遮蔽的边缘化过程，如同一部微型的城市现代化寓言，通过拟人化的手法，作者成功地将城市发展中的权力更迭与文化变迁，转化为读者能够情感共鸣的人生故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李系德的语言表达不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构建吉隆坡地方感的艺术媒介。他的粤语书写如同一条地下暗流，承载着社群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他的多语杂糅如同一幅拼贴画，展现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共存与交融；他的感官描写与拟人化修辞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物理空间与情感记忆。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这些语言策略共同构建了吉隆坡独特的地方感，使城市空间超越了简单的物理坐标，成为富含情感与文化意义的人文地景；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看，这些语言表达不仅保存了城市的历史

记忆，更创造了解读城市的文化框架，使个体记忆能够通过共享的语言系统融入集体记忆，形成华人社群的文化认同。这些语言策略共同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叙事语言，使《隆情岁月》超越了简单的城市记录，成为理解吉隆坡城市文化与地方感的文学典范，一部用文字砌成的城市记忆方舟。

六、比较视野：当代马华文学的地景叙事

6.1 与同代马华作家的地景叙事比较

当我们将李系德的城市书写置于当代马华文学的版图中，其独特性便如明月般清晰可见。在这幅马华文学的拼图中，黄锦树的《死在南方》以凝重的历史批判笔触勾勒吉隆坡的轮廓，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成为一个承载历史创伤与文化疏离的异化空间，充满了流亡者的漂泊感与历史的沉重负荷[41]。黎紫书的《流俗地》则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将城市空间转化为记忆与想象交织的精神地景，在现实与虚构的边界游走，探索城市空间的隐秘维度[24]。

与这些充满实验性的文学探索相比，李系德的《隆情岁月》选择了一条更为亲民的叙事路径。他以平实而富有温度的笔触，通过饮食地景、城市变迁与个人记忆的交织，构建了一幅充满市井气息的城市图景。如果说黄锦树的城市书写是一幅表现主义的抽象画，充满象征与隐喻；黎紫书的城市想象是一场超现实的梦境，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的边界；那么李系德的城市叙事则更像一幅写实主义的风俗画，细腻捕捉城市日常生活的微妙质感，以及隐藏在平凡表象下的深厚情感。

从叙事声音来看，黄锦树常采用疏离化的叙事视角，通过陌生化的手法重新审视城市空间，其目的是打破读者的惯性认知，引发对城市空间及其政治、历史维度的批判性思考。这种叙事策略源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姿态。张贵兴的“雨林三部曲”则通过自然景观的细腻描摹，以诗性的语言重现雨林的神秘与原始，展现人与环境的复杂互动，其叙事特点是高度的文学性和象征性，带有生态批评的思想内涵。

李系德则选择了一条迥异的叙事道路。他采用亲切自然的叙事语调，通过粤语表达、饮食体验与个人记忆的交融，营造出一种熟悉亲切的地方感。这种叙事声音如同一位老友在茶座上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文学修饰，却流露出真实而深厚的情感。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看，这种日常生活话语更易引起读者的记忆共鸣，因其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经验更为接近，能够更直接地唤起集体记忆中的情感成分。李系德不试图以统一的作者声音覆盖城市的多元面向，而是让城市中的各种声音——小贩的叫卖、街坊的闲聊、方言的口语——自然流淌，形成一种多声部的城市交响。

从地景选择的角度审视，李系德对街头小吃摊、老式戏院、传统商场等平民化空间的聚焦，与许多关注精英文化场所的马华作家形成鲜明对比。例如，英培安的《骚动》着重描写知识分子活动的文化空间，如咖啡馆、大学校园、艺术沙龙等场所；方北方的《陈六使》则聚焦于南洋大学等教育机构，探讨知识分子与殖民地文化政治的复杂关系。这种地景选择的差异，反映了不同作家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偏好和价值取向。从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看，这些不同的空间选

择反映了作家个人经验与城市之间的特殊联系，展现了地方感的个体差异性与主观性。

李系德独特的地景选择，体现了他对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深厚情感，以及对普通市民生活经验的珍视。这种“由下而上”的城市书写视角，展现了普通居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赋予城市空间以文化意义，创造出官方规划之外的城市记忆与认同。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看，这些日常生活空间正是普通民众形成集体记忆的重要场所，通过记录这些看似平凡的空间经验，李系德实际上保存了一种更为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城市集体记忆，展现了集体记忆如何在平凡的日常实践中形成与传承。这种“由下而上”的城市书写视角，不仅填补了马华文学中的一项空白，也为理解城市文化的多层次性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视角。

6.2 《隆情岁月》的文学成就

《隆情岁月》的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其地方感营造的艺术创新上。李系德通过粤语书写、感官描写与谐音修辞等多样化的语言策略，成功地构建了一种兼具地方特色与抒情深度的叙事语言。特别是在饮食地景的描述中，作者对味觉、嗅觉、触觉等感官体验的细腻捕捉，使读者能够通过文字重温那些已逝或正在消逝的城市味道，从而在感官层面上建立与城市空间的情感连接。从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看，这种感官描写直接呈现了经验空间的具体质感，使抽象的城市记忆获得了具体的感官锚点，展现了地方感如何通过多重感官通道被感知与表达。这种将抽象城市记忆具身化的叙事策略，不仅丰富了文学表现的维度，也创造了一种更为亲切、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想象，使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通过共通的感官经验进入文本构建的城市世界。

在记忆书写的情感深度方面，《隆情岁月》展现出罕见的真挚与细腻。与许多采取疏离姿态的马华作家不同，李系德毫不掩饰自己对吉隆坡的深厚情感，无论是对老式戏院的怀念，对街头小吃的眷恋，还是对城市变迁的感伤，都流露出作者与这座城市之间的深厚情感纽带。特别是在《为食街猪杂粥 稠浓情更浓》一文中，作者通过对友人谢文成英年早逝的回忆，将日常饮食记忆与生死离别的深刻情感相融合，展现了记忆书写如何超越简单的怀旧，成为连接个人与集体、过去与现在的情感桥梁。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看，这种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反映了个体如何通过特定场所的共享经验，将私人情感纳入集体记忆框架，使个人悲欢与社群历史相互映照，展现了集体记忆的情感维度。

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情感真挚的记忆书写体现了作者对他所书写的城市空间和人物的伦理责任。李系德文本中流露的对城市空间的深情与责任感，对普通居民生活经验的尊重与珍视，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伦理，既避免了精英知识分子俯视城市的傲慢，也超越了简单的怀旧情绪，展现了一种建基于日常生活的文化批判意识。他对城市变迁的感伤不是无根的乡愁，而是源于对城市文化连续性和社群认同的关注，体现了一种深思熟虑的文化保存立场。

语言风格的个人特色是《隆情岁月》另一重要成就。李系德善于将粤语的幽默感与生活智慧融入叙事，如对“大钟楼”的拟人化描述、对商店名称的谐音解读等，都展现了作者独特的语言创造力。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这种方言书写不仅是语言形式的选择，更是一种文化定位的表达，反映了作者如何通过选择特定语言系统表达其文化认同与地方依恋。通过将日常使用的粤语融入文学创作，李系德将边缘化的方言带入文学空间，赋予其文学尊严，同时也使

文学作品更贴近普通读者的生活经验，缩小了文学与日常生活的距离。

同时，他对多语环境的敏感把握，以及在叙事中自然融入马来语、英语等元素的能力，也反映了作者对马来西亚多元文化语境的深刻理解。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看，这种多语言书写反映了记忆的社会框架如何在多语环境中形成复杂的叠加结构，不同语言群体如何通过各自的语言系统建构对同一空间的不同记忆，以及这些不同记忆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相互影响。通过保存方言表达和本地词汇，李系德实际上保存了一种正在消失的文化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他的文本因此成为理解马来西亚华人日常语言实践的重要文献。

6.3 《隆情岁月》的文化反思

从文化反思的角度看，《隆情岁月》虽然采取怀旧的叙事基调，但并非简单的过去美化。作者通过对城市变迁的细致观察，特别是对旧建筑消逝、传统饮食文化变异以及城市现代化带来的记忆断层的描述，展现了现代化进程对城市文化记忆的冲击与挑战。在《Fajar 大地消失 不留历史痕迹》一文中，作者对已消失商场“不留任何历史痕迹”的感叹，既是对个人记忆消逝的悲伤，也是对城市文化记忆保存困境的深刻思考。从哈布瓦赫的记忆物质锚点理论看，当记忆依托的物质空间消失后，集体记忆的传承将面临重大挑战，需要通过其他媒介如文学、影像等重建记忆的物质锚点，以维系文化连续性。李系德的文学书写正是这种记忆保存工作的重要尝试，通过文字重建已消失的城市空间，为那些失去物质载体的记忆提供新的存在形式。

李系德的地景叙事还展现了对阶层视角的自觉意识。通过聚焦于街头小吃、传统商场、老式戏院等平民化空间，作者呈现了一个与精英文化视角不同的吉隆坡，揭示了城市文化记忆的阶层差异与多样性。特别是在对比现代商业空间如 Mid Valley 谷中城内的高档餐厅与传统街边小吃时，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城市现代化如何导致饮食文化的阶层分化，从而对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文化平等问题提出了隐含的思考。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不同社会阶层因其经济能力、教育背景、文化资本的差异，往往形成不同的城市感知与空间实践，创造出截然不同的城市经验。通过记录那些普通民众日常活动的城市空间，李系德揭示了经验空间的阶层维度，展现了城市如何在不同社会群体的感知中呈现出不同面貌。

本土认同与文化遗产的思考贯穿《隆情岁月》全书。通过对吉隆坡地景的深情书写，李系德不仅记录了个人与城市的情感连结，也探索了华人社群如何在异域空间中构建文化身份的复杂过程。特别是通过方言书写、饮食记忆与城市空间的交织叙事，作者揭示了文化认同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得以维系与传承，提供了理解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持续性的新视角。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看，文化认同需要通过具体的记忆实践不断更新与确认，而这些记忆实践往往嵌入在日常生活的微观细节中。李系德通过记录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文化实践——饮食习惯、方言表达、空间使用——展现了文化认同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得以形成与维系。这种对日常文化实践的关注，超越了简单的文化本质主义，提供了理解文化认同动态性和创造性的新方法。

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在与本地环境互动中不断重构的结果。李系德笔下的饮食变异、建筑嬗变与语言混融，都展现了这种文化调适与创新的过程，反映了

离散华人如何在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同时接纳本土元素，发展出既有传统根基又具本土特色的新型文化认同。从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看，这种文化适应与创新正是地方感形成的重要途径，通过将原乡文化元素与本土环境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地方文化，使异地空间逐渐转化为情感家园。通过记录这些文化适应与创新的具体案例，李系德为理解离散族群的地方感构建提供了生动的文学见证。

总体而言，《隆情岁月》作为城市地景叙事的文学实践，既继承了马华文学对本土空间的关注传统，又通过其独特的方言书写、饮食记忆与个人化叙事，为马华文学的地景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其文学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正在消失的城市记忆，更在于通过日常空间的书写，揭示了文化认同形成的微观机制，以及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连续性与变革的辩证关系。从段义孚的经验空间理论看，李系德成功地展现了普通民众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感知和定义城市，创造出官方规划之外的文化地图；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看，他细致记录了城市记忆如何通过具体的物质空间与社会实践得以形成和传承，以及当这些记忆载体消失时，文化记忆如何面临挑战与重构。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看，李系德的地景叙事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感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案例，展现了地方文化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策略，具有超越马华文学范畴的普遍意义。

七、结论

7.1 研究发现总结

穿行于李系德《隆情岁月》构建的文字城市，我们得以触摸到一座正在消逝的吉隆坡的文化脉搏。本研究通过对《隆情岁月》地景叙事的系统分析，发现李系德的城市书写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

首先，李系德采取了一种“由下而上”的平民化视角，使其城市书写区别于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城市想象。他的目光聚焦于街头小吃摊、老式戏院、传统商场等日常生活空间，这些被主流文学话语常常忽略的边缘地带，在他笔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尊严。这种视角选择不仅是审美偏好的体现，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政治意涵。李系德的城市书写恰恰关注了这种“战术性”的城市实践，展现普通居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为城市空间赋予文化意义，创造出官方规划之外的城市记忆与认同。

其次，饮食地景在李系德的城市书写中占据核心位置。通过描绘地方饮食，他构建了一幅立体多元的城市味觉地图，将抽象的文化记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感官体验。半山芭为食街的猪杂粥、颂记客家式牛肉粉、“醉猫”海鲜菜馆，这些看似平凡的饮食场所，在作者笔下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连接个人记忆与集体认同的情感纽带。味觉与嗅觉记忆是最原始、最持久的记忆形式，其唤起情感的能力远超视觉和听觉。李系德对城市饮食的细致描摹，巧妙利用了这种感官记忆的特质，创造出一种超越视觉中心主义的城市书写，使读者能够通过味觉想象重温城市的滋味，在感官层面上与城市空间建立情感连接。

第三，李系德的城市书写展现出独特的方言语言特色。他大量运用粤语词汇、谐音修辞与

口语化表达，创造了一种兼具地方特色与抒情深度的叙事语言。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身份的标志和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保存方言表达和本地词汇，李系德实际上保存了一种正在消失的文化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他的文本因此成为理解马来西亚华人日常语言实践的重要文化档案。

通过对《隆情岁月》的分析，我们发现李系德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建构文化记忆与地方感：一是空间记忆的个人化叙事，将城市地标与个人成长经历紧密结合；二是感官体验的记忆化处理，通过精准捕捉感官细节使读者重温城市味道；三是历史事件的空间化表达，展现历史事件在城市空间中留下的记忆刻痕。这些叙事方式的背后，是作者对城市空间的深度情感投入与文化认同，体现了段义孚地方感理论与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交织应用。李系德将吉隆坡视为情感家园而非简单地理坐标，其地景叙事探索了个人与城市之间的复杂情感关系。同时，作者对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环境的敏感把握，使其能够通过方言书写、多语杂糅等语言策略，展现城市空间中的文化多样性与身份认同的复杂构成。值得注意的是，李系德对“五一三”种族冲突在金华戏院的亲身经历的记述，展现了重大历史事件如何通过个人经验被铭刻在特定空间，成为集体创伤记忆的载体。这种对历史事件的空间化记忆，正是“记忆场所”理论所强调的记忆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即历史事件需要通过特定空间得以具体化，而空间意义也在历史事件中得到重新定义。通过这种个人化的历史叙事，李系德不仅记录了一段重要的城市历史，也提供了理解集体创伤如何通过空间记忆得以传承与处理的重要案例。

7.2 研究意义与启示

本研究对马华散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将地方感理论与文化记忆理论引入马华散文分析，构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传统马华文学研究多关注文本的政治意涵或美学特质，而本研究通过将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相结合，开拓了理解马华散文地景叙事的新维度。特别是对饮食地景如何承载文化记忆、方言书写如何构建文化认同的分析，丰富了马华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模式。

其次，深化了对马华散文地景叙事传统的理解。通过对李系德《隆情岁月》的系统分析，本研究揭示了城市空间如何在马华散文中得以表达与重构，特别是那些常被文学研究忽视的日常生活空间——街头小吃摊、老式戏院、传统商场——如何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与聚焦于精英文化空间的传统研究相比，本研究通过关注这些平民化空间，展现了马华散文地景叙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理解马华文学的城市想象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第三，通过关注方言书写与多语杂糅现象，拓展了马华文学语言研究的维度。李系德大量运用粤语词汇、谐音修辞与口语化表达的写作实践，挑战了标准中文的文学规范，展现了马华文学语言的创造性与本土特色。本研究对这些方言表达的系统分析，不仅丰富了马华文学语言研究的内容，也为理解语言选择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案例，展现了马华作家如何在多语环境中通过语言实践构建文化主体性。

对城市文学研究而言，本研究提供了理解城市记忆如何通过文学表达得以保存与传递的具体案例。李系德的地景叙事展现了文学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扮演文化记忆保存者的角色，通过

对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城市空间进行文学重构，抵抗现代化带来的记忆消逝。李系德通过记录那些被现代城市规划所忽视的日常空间和生活经验，为我们保存了一种正在消失的城市知识和生活方式，他的文本因此成为理解城市文化变迁的重要史料。同时，作者对饮食地景的关注提醒研究者重视城市文学中的感官维度。传统城市文学研究多关注视觉景观和空间结构，而李系德的饮食书写展现了城市经验的多感官特质，为城市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通过关注味觉、嗅觉、触觉等非视觉感官在城市经验中的作用，本研究丰富了城市文学的研究维度，为理解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现实层面，本研究揭示了文学书写作为文化记忆保存手段的重要价值。在城市更新加速的今天，李系德的记忆保存工作具有重要的文化保护意义。作品中对已消失建筑的详细记录，以及对传统饮食文化的细致描绘，为理解吉隆坡的城市历史与文化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这种文学性的城市记忆保存，弥补了官方历史叙事的不足，为城市文化保护工作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方式。通过文学记录那些被官方历史忽视的日常空间和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李系德的作品展现了“历史从下”的文化保护视角，为理解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7.3 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与局限，未来研究可从三大方向拓展：首先，采取跨媒介视角，比较文学书写、影像表达、数字媒体等不同媒介在地景表达上的异同。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城市记忆的保存与传递方式日益多元化。电影、纪录片、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形式为城市记忆提供了新的表达平台，创造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感官体验和传播效果。未来研究可以探索这些不同媒介如何塑造城市记忆，各自有何优势与局限，以及传统文学书写与新媒体表达如何在文化记忆建构中形成互补关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媒体的参与性和互动性为城市记忆的民主化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普通市民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城市记忆，形成更为多元的城市叙事。这种媒介变革如何影响城市记忆的形成与传播，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其次，采取更广阔的区域比较视野，将马华城市书写置于东南亚区域甚至华语语系文学的背景中考察。马华文学的地景叙事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深植于东南亚区域文化与华语语系文学的广阔语境。通过比较马华作家与泰华、印尼华、菲华等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城市书写，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华人离散社群如何通过文学表达建构地方认同，揭示东南亚区域内华人文学的共性与差异。同时，将马华城市书写与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华语文学相比较，可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华语文学的地域特性与跨区域联系，深化对华语语系文学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理解。这种比较研究不仅能够丰富马华文学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构建更为全面的华语文学地图，理解不同地区华语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关系。

第三，关注数字技术在城市记忆保存中的应用，探讨如何将传统文学表达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拓展文化记忆传承的新途径。数字人文技术为城市记忆的保存与呈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数字地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可以创造沉浸式的城市记忆体验，使读者能够以更为直观的方式感受已消失的城市空间。未来研究可以探索如何将李系德等作家的城市书写数字化、可视化，创建交互式的文学地图或虚拟城市导览，使文学保存的城市记忆能够以更加生动、直

观的形式传递给年轻一代，增强文化记忆的传承效果。同时，也需要关注数字技术对地方感形成的潜在影响，探讨虚拟空间体验与实体空间经验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媒介变革对文学地景表达的启示与挑战。

总结而言，李系德《隆情岁月》的地景叙事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城市空间、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文学案例。通过其独特的方言书写、感官叙事与个人化记忆，他成功构建了一幅充满市井气息与人情温度的吉隆坡城市图景，为马华文学的地景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全球化和城市现代化加速的今天，这种关注日常空间、珍视普通人生活经验的文学实践，具有超越马华文学范畴的普遍意义，为我们思考如何在急速变化的现代世界中保存文化记忆、维系地方认同提供了珍贵的智慧资源。

参考文献

- [1] 方修. 马华新文学史稿[M]. 新加坡: 世界书局, 1962.
- [2] 张锦忠. 南洋论述: 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M].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03.
- [3] 王列耀, 彭贵昌. “花踪文学奖”与马华文学新生代的崛起[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7(12): 1-8+161.
- [4] 许文荣. 南方喧哗: 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M]. 吉隆坡: 南方学院出版社, 2004.
- [5] 许文荣. 马华文学中的三江并流: 论中国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微妙同构[J]. 华文文学, 2010(01): 39-47.
- [6] 金进. 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6(01): 75-84.
- [7] 王文艳. 论 20 世纪 90 年代马华报纸文艺副刊与马华“新生代”——以《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为中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5(06): 9-17.
- [8] 朱崇科. 马华文化 / 文学本土性的建构策略及其限度析论[J]. 东南亚研究, 2006(04): 79-84+55. DOI: 10.19561/j.cnki.sas.2006.04.013.
- [9] 黄锦树. 马华文学与中国性[M].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12.
- [10] 许文荣. 南方喧哗: 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M]. 吉隆坡: 南方学院出版社, 2004.
- [11] 韦福安, 么加利. 上金船街: 一个从边疆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文化地景[J]. 广西社会科学, 2022(03): 151-160.
- [12] 谢征达. 新马都市叙事的三种模式——以丁云小说为例[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0(04): 46-54. DOI: 10.16228/j.issn1008-0163.2020.04.012.
- [13] 张羽. 台湾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研究[J]. 台湾研究集刊, 2012(03): 72-80.
- [14] 杨彦清. 从地景描写到文化空间——从《长日留痕》谈起[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48(05): 64-68.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1.05.011.
- [15] 马超群, 蒋成浩. 马华文学中的本土历史重构与中国性想象——以黄锦树小说集《雨》《死在南方》为例[J].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7(01): 108-112. DOI: 10.19488/j.cnki.45-1378/g4.2020.01.026.
- [16] 王列耀, 彭贵昌. “花踪文学奖”与马华文学新生代的崛起[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7(12): 1-8+161.
- [17] 潘碧华. 马华文学的现代阐释[M].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2009.

- [18] HALBWACHS M.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9] HALBWACHS M. On collective memor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20] ASSMANN A. Cultural memor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functions, media, archiv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21] CLIFFORD J.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2] 贾颖妮. 历史记忆的摆荡: 张贵兴“雨林三部曲”的华人拓荒史书写[J]. 文艺争鸣, 2018(08):142-147.
- [23] 陈瑶琼. 新生代马华小说中马来本土语境下“中国性”的呈现[J]. 名家名作, 2023(16):137-139.
- [24] 岳寒飞. 论马华作家黎紫书《流俗地》的空间叙事[J]. 华文文学, 2022(03):83-90.
- [25] 黄万华. 马华文学: 在中国与本土之间[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 [26] 佟伯明. 局外人的凝望[D]. 武汉大学, 2023. DOI:10.27379/d.cnki.gwhdu.2023.000158.
- [27] 王璇. 从南京到台湾——吴浊流的祖国想象与故乡再现[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0(04):74-81. DOI:10.16228/j.issn1008-0163.2020.04.016.
- [28] 刘秀珍. 后现代视域下新世纪台湾散文空间书写与身份认同[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1(03):22-28. DOI:10.16228/j.issn1008-0163.2021.03.008.
- [29] 周银银. 离散视角下《无声告白》的空间叙事及其文化隐喻[J]. 华文文学, 2023(05):46-57.
- [30] 张翼. 地景·民风·文化记忆——论安琪诗集《暴雨和绵羊》[J]. 文艺论坛, 2024(03):102-106. DOI:10.14039/j.cnki.cn43-1515/i.2024.03.002.
- [31] 李文珊, 焦迎春. 黄锦树小说的地景诱惑与气氛迷狂[J]. 华文文学, 2024(02):61-68.
- [32] 段义孚. 空间与地方[M]. 潘桂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33]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 [34] NORA P.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J]. Representations, 1989(26): 7-24.
- [35] STEWART S. On longing: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6] 黄丽丽. 论张贵兴《群象》与《猴杯》的感官书写[J]. 华文文学, 2015(06):110-116.
- [37] 向绍华. 云南绮罗侨乡地景变迁的历史人类学分析[J].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 2016(02):294-309.
- [38] APPADURAI A.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39]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40] 赵环. 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文化解读[J]. 河南社会科学, 2013, 21(08):94-96+108.
- [41] 黄锦树. 死在南方[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